

开拓与承续:曹丕、刘勰论建安七子

胡根法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要:建安七子是曹丕、刘勰共同的研究对象,前者是此研究的开拓者和权威,后者继承了前者的观点,并多处引用或复述前者对七子的评论。二人均将文体作为研究七子的切入点,并强调文气对文人和文章的重要作用。刘勰对七子的讨论较曹丕深入和详尽,并对曹丕的观点有丰富且重要的例证和补充,二人的研究也因此呈现出明显的互文特征,其研究多有相互印证之处。刘勰的建安七子研究不但是对曹丕的承续,更是对自身“弥纶群言”之志的明证。

关键词:曹丕;刘勰;建安七子;《文心雕龙》;《典论·论文》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8X(2017)02-0063-09

DOI:10.16398/j.cnki.jbjieissn1008-228x.2017.02.009

魏文帝曹丕(187—226)的《典论·论文》(以下简称《论文》)对当时孔融等七位文人有如下评价: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璉,东平刘楨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1]720}

曹丕认为孔融、王粲、徐幹等七人博学多才,自铸文辞,在当时的文坛上并驾齐驱,因此称他们为“七子”。由于“七子”一起活跃在汉末建安时期(196—220),且曹丕这篇《论文》影响深远,后人便称他们为“建安七子”,而曹丕即此称的首倡者。^①

南朝齐梁时期的刘勰(约465—521)也很关注这七人,所著《文心雕龙》对他们有颇多论述,比如《才略》篇不但谈及此七人,还称王粲之诗赋为“七子之冠冕”^{[2]700}。“七子”一语出现在《文心雕龙》之中,大概仅此一处,但足以表明,建安“七

子”之称由曹丕首倡,已为刘勰所承续。本文拟对曹丕、刘勰二人关于建安七子的论述进行梳理和分析,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希望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相关研究有所推进。

一、曹丕、刘勰的七子研究概述

由上述引文可知,曹丕认为七子是当时文坛的代表人物,他在《又与吴质书》对此有更为明确的表述:“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吾与足下不及见也。”^{[1]592}曹丕认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将无缘见到可以和七子相匹敌的作家。

上述《论文》引文尚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曹丕认为,七子虽然文才非凡,但彼此之间互不服气,“斯累”二字正是就这一现象而言。二是曹丕自称“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有资格写这篇《论文》,对七子进行评论。其中“斯累”二字,实有所指: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

收稿日期:2017-03-08

作者简介:胡根法(1975—),男,山东菏泽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南昌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E-mail:hugenfa2013@163.com

① 有论者认为:“曹丕从俯视一个时代的整体着眼,选定孔融等七人作为其杰出代表,暂且搁置当时健在的曹植、杨修,则显得视角高远,公允稳妥。所以,将建安七子的称谓赋予孔融等七人,除了少数文人持有异议外(如明代杨德周编辑《汇刻建安七子集》,以曹植取代孔融),得到了历代绝大多数文人的认可。”见韩格平:《建安七子综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1]720}

此处引文在《论文》中的位置恰在上段引文之前,其中“不自见之患”一语指的是自古以来“文人相轻”的弊病,也即“斯累”。以上分析表明,七子也有文人相轻的毛病,而曹丕撰写《论文》,旨在对七子和此种弊端及其原因进行评价和分析。南朝时期的萧统将曹丕的《典论·论文》编入著名的《文选》,其开篇即是上述两处引文,而末句则为:“融等已逝,唯幹著《论》,成一家言。”^{[1]721}由此可知,在《文选》版《论文》的文本中,篇首和文末均直接指向建安七子,事实上其主要内容都围绕七子展开议论,因此我们可将《论文》视为一篇关于建安七子的专论,而曹丕则是对建安七子进行系统研究的开拓者^{[3]304-305}。

其实曹丕也是一个关于建安七子的权威研究者。首先,他和七子处在同一时代,对他们了解较多,并与除孔融之外的六人关系密切。其《又与吴质书》洋溢着他对诸子的回忆与思念:“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1]591}可知曹丕和诸子友情深厚,曾经一起游处赋诗,对他们本人及其诗文必定也有充分的了解。其次,在七子去世后,曹丕亲自为他们编撰文集。据《又与吴质书》,徐幹等六人死后,曹丕“倾撰其遗文,都为一集。”^{[1]591}他还在这封信中说,每当他想起这六人,或读到他们的文章,他都不胜思念并感到很痛心:“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1]591}另据《后汉书·孔融传》,曹丕深爱孔融的文辞,并在孔氏死后以高价搜集其文章,以至于“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4]2299}曹丕亲自收集七子的遗文,为他们每个人编撰文集,也因此拥有研究他们的第一手资料。第三,曹丕认为自己没有文人相轻的弊病,能够审己度人,可以对七子进行相对中立客观的评价。因此,曹丕

不但是建安七子研究的开拓者,而且理应被视为此项研究的权威。

刘勰对建安七子也有很高的评价,这首先体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幹徇质于海隅,德琰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侶,傲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2]673-674}

刘勰在这里描绘的是“建安之末”的文坛盛况,他先从时代背景谈起,然后涉及其代表文人如三曹、七子(除孔融外)、路粹(字文蔚)、繁钦(休伯)、邯郸淳(字于叔)、杨修(字德祖)等,最后总结出这些文人的个性风采和创作特点。孔融没有出现在刘勰的这份名单之中,原因在于孔氏已于建安中期(十三年)被曹操处死^{[5]372},另外他和曹氏父子领导下的邺下文人集团也无关联。但纵观整个《文心雕龙》,刘勰对孔融的论述颇多,评价也颇高,对此下文将有详细分析。这里先指出两点:一是如前所述,曹丕的建安“七子”之说已为刘勰接受;二是在刘勰的上述建安作家名单中,三曹之下便是“七子”中除孔融之外的六人,他们位在三曹之后,路粹、杨修等人之前,这即是说,王粲等六人被刘勰认为是当时除三曹之外的最具实力的作家。《才略》篇对这一点进行了确认,刘勰在论及建安文坛青年才俊的才略时,首先谈及曹丕、曹植兄弟,然后接着说:

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琳琅以符橄擅声;徐干以赋论标美;刘桢情高以会采,应璩学优以得文;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有足算焉。^{[2]700}

刘勰认为,在当时文坛的实力派作家中,在曹氏兄弟以下,可堪称者有十人,首先七子中的王粲,其

次是其他五人,随后为路粹等四人。以上分析表明,刘勰同时接受了曹丕关于“七子”在建安文坛之地位的界定。

在七子之中,孔融确实显得比较特殊。虽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次论及其人,但在上引两段文字中,六子集中亮相,唯独孔氏不在其中。《才略》篇倒是谈及孔融,刘勰认为:“孔融气盛于为笔……有偏美焉。”^{[2]699}但其位置其实是在上段引文之前,这肯定与刘勰以时间顺序进行论述的方式有关,从而表明他认为孔氏是比其他六子及曹丕兄弟较早一代的作家,但也很有可能刘勰认为孔融成名于建安时期以前。纵观整个《文心雕龙》,我们从未发现刘勰将七子并置而论之处,这是刘勰与曹丕的不同之处,或许表明他对曹丕的七子人选持有一定的保留意见。而曹丕将孔融列为七子之首,大概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孔融在七人中出生最早,年辈最长;二是曹丕非常喜欢孔融的文章。据《后汉书·孔融传》:“魏文帝深好融文辞,每叹曰:‘扬、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4]2299}其中“扬、班俦也”一语亦见于曹丕的《论文》,表明他认为孔融的文辞可与扬雄、班固相媲美,因此不惜重金求购孔氏之文章。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说“文举属章,半简必录”^{[2]456},所指正是曹丕尽力辑录孔融的文章这件事。

这里再做一点补充:刘勰在上述引文中称“德琰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而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有如下两句:“德琰常斐然有述作意”和“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1]591}刘勰之语显然直接来自曹丕,是对后者观点的借用和复述。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刘勰接受了曹丕首倡的七子说,同意其关于七子在建安文坛地位的判断,并在一些地方借鉴了其关于七子的评价观点,从而使得二人关于建安七子的论述有多处相合甚至相同。

以上仅就荦荦大者而论,曹丕和刘勰二人对建安七子的评价到底有何具体的异同之处?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下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二、曹丕、刘勰论“文人相轻”及七子与文体

曹丕的《论文》以“文”字开篇,可谓开门见

山,但其实际意旨却在于分析和批评一种与“文”有关的陋习,矛头直指文的作者即文人。他认为,由于文体多样,而人的能力有限,没有人可以兼善众多的文体,但是大家又往往善于发现自己的长处,而忽视或不愿承认己之所短,“文人相轻”的现象便由此而生。因此这一弊病实际上与“文”和“人”都有关系,曹丕将其称作“累”和“不自见之患”。在此基础上曹丕又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1]720}可见,这“四科”八种文体各有其特点和相应的写作规范,而人的能力有限,于是文人中便有了“偏才”和“通才”的分化。但从《论文》中来看,曹丕并不认为兼通所有文体的通才是存在的,故实际上古今的文人均为偏才。七子当然也不例外,但曹丕注意到,若要让他们七人“以此相服,亦良难矣”,即七子也有文人相轻之患。于是曹丕对七子的评价,便从对文体的讨论和对“文人相轻”现象的批评开始。

曹丕关于文人相轻的观点及对这种弊病的批评得到了刘勰的认同。后者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2]713}这可以看作曹丕《论文》中“贵远贱近,向声背实”^{[1]720}一语的翻版。刘勰接下来说:“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2]714}这是对上述曹丕之语的改写和直接引用。随后刘勰称赞道:“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2]714}总之,刘勰完全同意曹丕的观点。

建安七子的创作在文体上多种多样,而每一种文体又各有其自身的特点,对此曹丕和刘勰亦各有评价。《论文》在谈及七子的创作时说: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瑯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璩和而不壮,刘楨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1]720}

这段文字紧接在七子简介之后,从文体的角度对七子各自“所长”和“所短”作了简要的分析。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再次谈到这个问题:

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当时。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无以远过。^{[1]591-592}

由此可知,文体是曹丕论文和评价七子的主要角度和途径。他对七子在创作上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七子各自长处和不足。以王粲(字仲宣)为例,曹丕认为他是七子中最擅长写辞赋的,但总体质量不一。刘桢(字公幹)善写五言诗,其中的佳作在当时堪称一绝,但其缺点则在于不够密致和遒劲。曹丕对其他五子的评价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总之,曹丕眼中的七子虽才华出众,但他们都是偏才,即使在他们自己所擅长的文体上,其不足处仍相当明显。

从前引《文心雕龙·才略》中的文字可知,刘勰也从文体的角度,对七子进行过概括性评价,但他在此处只谈及七子之长,这与曹丕有所不同。下面我们就以七子中的孔融和刘桢为例,分析曹、刘二人是如何对他们进行评价的,其中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又有哪些。

首先看孔融。如前所述,曹丕将他列为七子之首,原因之一在于他喜爱孔氏之文章。尽管如此,曹丕对孔氏文辞的评价仍然褒贬参半:他认为孔氏的创作格调高妙,好的篇什足以比肩扬雄和班固,但缺陷在于文辞虽盛,论理不足,其中甚至还掺杂有嘲戏的语气。^①而在上引《才略》篇中,刘勰认为孔融行文以“气盛”见长,让人读起来有“偏美”的感觉。“偏美”二字,微妙地体现出曹、刘二人在评价孔融文辞上的一致之处。但曹丕似乎并未明言,他所谈论的到底是孔融所写的哪一种文体。

刘勰则从多个文体的角度对孔融进行评价。如《章表》篇认为:“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2]407}这是谈孔融写的章表文气势旺盛、格调高超。当论及孔氏所写的碑碣文时,他首先指出蔡邕(伯喈)的碑碣之作是后汉以来的第一人^②,同时认为:“孔融所创,有摹伯喈;张陈两文,辨给足采,亦其亚也。”^{[2]214}刘勰将孔融与蔡邕相提并论,可知孔融的碑碣创作水平是极高的,但相比之下,曹丕并未对孔氏这一特点进行任何评价。上述各例都是刘勰对孔融的溢美之词,但他也不吝批评。如《论说》篇认为“孔融《孝廉》,但谈嘲戏。”^{[2]327-328}刘勰还直接借用曹丕《论文》中的“嘲戏”一词,以说明孔氏论说文存在“不能持论”的特点。而在《诏策》篇中,刘勰对孔融所写的教令文进行评价。他认为,“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然而“孔融之守北海,文教丽而罕施,乃治体乖也。”^{[2]360}意思是说,教令之颁布,乃出于让老百姓仿效之目的,但孔融的教令文写得很华丽,却难于施行,可见其文才与实际的政治才能很不相符。刘勰所列举的上述这些孔融的缺点,大体上与曹丕对孔氏的评论(“不能持论,理不胜辞”)相吻合,这也使得我们有理由推测:曹丕在《论文》谈及孔融的缺点时,是就孔氏的嘲戏文和教令文而言的。总的来说,刘勰对孔融的评价显然更为全面和丰富,某些地方堪作曹丕相关论点的具体例证。

曹、刘二人对刘桢的评价都相对较多。曹丕对刘桢的评价主要有二:一是从文体的角度看,曹丕最为推崇刘桢的五言诗;二是认为刘桢创作的优点在于“壮”“有逸气”,即文势豪壮、慷慨超越,缺点在于不够密致和遒劲。刘勰亦从文体的角度对刘桢进行了评价:“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2]66-67}刘勰把刘桢列为建安诗坛五言诗的代表作家之一,并指出其特点是“情高以会采”,这些评价与曹丕的评语(“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当

① 王鹏廷认为,孔融有些论体文章,“论据以偏概全,经不起推敲,并不足以支持论点,显然属于先入为主随心而发的文章”,也有文章“更是使气任性之作”,“主观片面,过于绝对化”。详见王鹏廷:《建安七子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0-171页。

② 刘勰认为:“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参见(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三《谏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4页。

时”)大抵相当。此外,刘勰还对刘桢在其他文体上的创作进行了评价,这一点恰为曹丕所无。如《书记》篇认为:“公幹笺记,丽而规益,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矣。”^{[2]457}刘勰认为刘桢的笺记之作文笔华丽,有益于规劝,实际上比其诗作更好,而世人没有关注这些笺记,是因为曹丕对它们未加评论。刘勰对曹丕的指责并非没有道理,这也是他认为曹丕之论“密而不周”^{[2]726}的证据之一。《论文》篇幅短小,无力兼顾众多的文体,这是他的问题所在。而《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多达二十来篇,涉及三十三种比较大的文体类型,在具体论述中又涉及多种较小的文体类型。^{[6]467}因此,刘勰能够从多种文体的角度,对建安七子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论述,这是他和曹丕最大的不同,同时也是对后者的丰富和补充。

以上试举孔融和刘桢为例,以求管中窥豹,对曹丕、刘勰从文体论的角度对七子创作的评论进行分析。相比之下,刘勰对七子的评论要比曹丕丰富和详赡。毕竟《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而虑周”^{[7]559}的文论专著,其文体论部分尤为如此,因此他对七子的评价,就可以依据他们的著述情况,涉及章表、诏策、碑、论等多个文体,这是曹丕那篇短小精致的《论文》所根本无法做到的,如在刘勰看来,孔融的碑碣、刘桢的笺记、徐幹的哀辞在当时都是最好的,曹丕都没有论及。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刘勰的观点在很多地方和曹丕是一致的,甚至就来自对曹丕的直接借鉴,包括对曹丕观点的直接引用。这其中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曹丕的《论文》向来被认为是第一篇文学批评专论,又第一次对文体进行了区分^{[8]93}。刘勰在梳理所谓“近代之论文”史时,就将曹丕的《论文》排在首位。《论文》之“密而不周”,其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其特点在于精炼简约、高度概括,只对七子最擅长的文体创作和最突出的创作风格进行描述和总结;二是当时的文体学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曹丕的所谓“四科”八

体,远不能和刘勰关于文体的论述相提并论。以上也正表明,就关于建安七子的评论而言,刘勰的《文心雕龙》正是对曹丕《论文》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点在其对文气的讨论时更为明显。

三、曹丕、刘勰论七子与文气

曹丕在《论文》中说: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1]720}

此即文气说之发端。曹丕认为气是文的主宰或灵魂,并以音乐为喻,说明文气可能来自天生,是作家的一种天赋。对此刘勰似乎完全赞同,首先他认为“魏文比篇章于音乐,盖有征矣”^{[2]656},即曹丕将文章与音乐作比是有根据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也多次在《文心雕龙》中探讨了气与文之间的关系,如《体性》曰:“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2]506}《风骨》篇认为“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并举例说:“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适也。”^{[2]513}这表明刘勰也像曹丕一样,对于气在文章中的重要作用有深刻的认识。但他对曹丕文气说的赞同,最明显的证据莫过于他对后者观点的直接引用: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幹,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2]513-514}

很明显,此处直接征引的是曹丕《论文》、《又与吴质书》以及刘桢的观点。文气说在《风骨》篇中占有核心位置,此亦可看作刘勰承续曹丕的最有力证据之一。^①顺便指出一点:曹丕偏爱孔融文辞,并不惜重金购买其文章,应该是源于他对文气的重视,而《论文》强调“文以气为主”,又称“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对孔融之文气的评价显然高

① 有论者认为:“气在于作家谓之气,形之文者谓之风骨。”参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161页。

于其他六子,这恐怕也是曹丕将孔氏列为七子之首的原因之一。在上引《文心雕龙·才略》中,刘勰认为“孔融气盛于为笔……有偏美焉”,可知二人对孔氏之文气有基本相同的认识。

鉴于上文已经谈过二人对孔融的讨论,这里将以《风骨》篇提及的徐幹和刘桢为例,来探讨曹、刘二人对文气的具体论述及其联系。我们先从徐幹谈起,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认为: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1]720}

曹丕在此对徐幹的评价主要有以下两点:徐幹善为赋,可与七子中“独自善于辞赋”的王粲相匹敌;其创作“时有齐气”^①,这是创作上的一个缺陷。

刘勰对徐幹的评价也有多处。在《才略》篇中,刘勰认为“徐幹以赋论标美”(见上引),这和曹丕的观点是一致的。曹丕对徐幹所著的《中论》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刘勰则没有直接对其进行评论。有研究者认为,刘勰认为“徐幹以赋论标美”,其中的“论”很可能就是指《中论》^②。相比之下,曹丕没有论及徐氏在哀辞这一文体上的创作,但刘勰却对此评价颇高。他在《哀吊》篇中说:“建安哀辞,惟伟长差善,《行女》一篇,时有恻怛。”^{[2]240}在刘勰眼中,徐氏的哀辞在建安文人中写得最好。但总的来看,徐幹的辞赋才是刘勰关注的重点,他两次对此做出评论。除了前述“徐幹以赋论标美”之外,《诠赋》篇还说:“伟长博通,时逢壮采。”^{[2]135}可见,在刘勰看来,徐幹的赋具有“美”和“壮采”的品质,而且正是由于学识上的博通,他才时常会写出具有这样壮丽华采风格的赋作。考虑到曹丕主张“诗赋欲丽”,徐幹所写的辞赋中,得到曹丕高度评价的《玄猿》等作品,很可

能就具有这种壮丽华采的风格。但“时有齐气”及“时逢壮采”中的“时”字暗示我们,徐幹并非所有的辞赋作品都具备这种风格,曹丕仅仅“标美”其四篇赋作,然后肯定地说,“然于他文,未能称是”,大概即就此而言。另外,刘勰同意并引用的曹丕的观点,也认为徐幹“时有齐气”。于是我们有理由认为:徐幹有些辞赋“未能称是”,乃由“齐气”所致,这恐怕是曹刘二人的共识。

李善在“徐幹时有齐气”一语之下注曰:“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幹亦有斯累。”^{[1]720}李周翰亦注曰:“齐俗文体舒缓,言徐幹文章时有缓气。”^{[9]967}这二人注中的“文体”均指文章写作的风格特征。李善和李周翰都认为:徐幹的文风“时有齐气”,即时有“缓气”或“舒缓”之气,这是由于他深受家乡齐地之风气习俗影响的缘故。由此可以看出,就某一具体作家而言,其才能和风格可能会带有些许地域乡土风气的影响和印迹,这就是文人的地域性特征。按照这种理解,我们不妨做如下推测:徐幹那些为曹丕所欣赏的佳作出自徐幹“时逢壮采”的发挥,作品面貌没有或仅呈现出较少的“齐气”特征,而其余辞赋作品则可能具有较为明显的“齐气”特征。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时有齐气”的徐幹,为什么他能够有“时逢壮采”的发挥?曹丕只做出了价值判断,却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答案是由刘勰给出的,他认为徐幹可以“时逢壮采”,原因在于其本人在学识上的“博通”。曹丕也许会同意刘勰的观点,因为他认为徐幹是“怀文抱质”的“彬彬君子”,其“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业,辞义典雅,足传於后”^{[1]591}。曹丕对徐幹本人及其所著《中论》的评价,可为刘勰“博通”一语的注脚。如果我们按照刘勰的这一解释进行推理,则徐幹学养之“博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齐气”所致之缺陷,从而使得他在辞赋创作上取得

① 一般认为,徐幹的“齐气”即指他的文气舒缓,这可能跟齐地人的性格有关(徐幹的籍贯地北海属于齐地)。参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161页;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

② 见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页。王鹏廷认为,“徐幹《中论》自成体系,为一子书作品”,它“与王符《潜夫论》、崔寔《政论》等一样,‘虽标论名,归乎诸子’”。参见王鹏廷:《建安七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页。

了可与王粲相匹敌的成就,以至于部分作品可与张衡、蔡邕相媲美。另外,刘勰引用曹丕的观点,也认为徐幹“时有齐气”,这可进一步使我们确信,徐幹有些辞赋“未能称是”,确由“齐气”所致。这也说明博通之学识并非万能,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此亦是曹丕偏才观中应有之义,恐怕是也曹、刘二人的共识。可见作家的作品风格 and 他们的个人气质、才气及所取得之成就是相符的。

至于刘桢,曹、刘二人相关评论也比较多,上文已经提及,这里只从文气的角度进行讨论。曹丕认为刘桢“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作品存在“壮而不密”的特点。有论者以为,“有逸气”则指刘桢“不受拘束、俊逸奔放的风格。”^{[6]31-32}而“壮”与上文的“壮采”意思接近,应该是“逸气”风格在文中的表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多次谈到刘桢的这一特点,如在《风骨》篇中,他就直接引用曹丕所谓刘桢“有逸气”的说法。类似之处也出现在其他各处,如《体性》篇认为“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2]506};《才略》篇则说“刘桢情高以会采”。刘勰对刘桢创作特点的评论莫过于他对刘桢本人观点的直接引用,如《风骨》篇:“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刘桢此处所言表明了他对孔融“卓卓”之“异气”的欣赏,其实他们二人风格比较接近,刘桢大概是感同身受,便有了惺惺相惜之情。这也说明曹丕、刘桢和刘勰三人对孔氏高妙之体气持有相同的看法。由此亦可知,文气说虽然由曹丕首创,但以气论文却并非曹丕的独创,至少在他所处的时代,他已经有了刘桢这样的同道者。^①

上文提到,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说:“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这是一种对作品风格、作家气质及才气之间关系的描述。刘勰就这个问题对大量的作家进行了考察,其中包括七子中的王粲和刘桢,并认为“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得

出的结论是“触类以推,表里必符”,此乃“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2]506}显见,“表”当就文章作品而言,“里”则指作家内在的气质、才气,作品风格和作家的气质及才气是统一的。有论者在研究曹丕对徐幹、孔融等人的评论后认为:“在曹丕看来,作品的气貌和作家的气质、才气等特征是统一的,作家有怎么样的气质、才气等特征,在其作品中就呈现出怎么样的气貌。”^{[10]36}这意味着曹丕和刘勰对作品风格、作家气质及才气之间关系的认识是基本相同的。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刘勰某些关于七子的论述,由于承续了曹丕的观点,使得二者之间有明显的互文特征,同时刘勰在一些方面对曹丕的观点有重要的补充,又使得二者之间可以相互印证,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二人的观点,加深对七子的了解。

四、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主要形成了如下结论:

(一) 曹丕是建安七子研究的开拓者和权威

曹丕的《典论·论文》为一篇建安七子专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将建安七子作为研究对象,重视并参考了曹丕的观点。他接受了曹丕首倡的七子说,认可后者关于七子在建安文坛地位的界定,并多处引用或者复述后者关于七子的评论,并将相关研究推向精致和深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曹丕是建安七子研究的开拓者,而刘勰则是此研究的承续者。另外,由于《论文》精炼简要,对相关观点的解释较少,而《文心雕龙》铺陈详尽、举证丰富,在引用或复述曹丕的观点时往往辅

(二) 文体是曹丕、刘勰二人研究七子的切入点

曹丕从文体的角度探讨了文人相轻的现象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七子的创作特点。刘勰同意曹丕关于文人相轻的观点,但他从文体

① 杨明认为,文气说“虽始于曹丕,却又不是他个人偶然的创造”,“在曹丕的时代,人们已用‘气’评述人物,还用‘气’说明与文有关的乐和言辞。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曹丕又进而用‘气’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并以‘气’评述作家”。详见王运熙、杨明:《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0页。

的角度对七子的讨论显然更为深入细致,在这一点上,曹丕《论文》“密而不周”与《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的特点显得格外明显。

(三) 曹丕、刘勰均强调文气对文人和文章的重要作用

曹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首倡文气说,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多处探讨了气与文之间的关系,其中《风骨》一篇多处直接征引曹丕《论文》和《又与吴质书》中的观点,意味着二人对作品风格、作家气质及才气之间关系的认识是基本相同的,此亦可看作刘勰承续曹丕的最有力证据之一。刘勰关于七子的论述,由于承续了曹丕的观点,使得二者之间有明显的互文特征。由于刘勰对曹丕的观点有重要的补充,二者之间可以互相发明、相互印证。

从某种程度上讲,承续这一事实首先意味着认同。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刘勰对于曹丕的文论观点基本上采取了认同和继承的态度。而在《才略》篇中,他还直接谈及曹丕本人的“才略”:

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愆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2]700}

刘勰对褒扬曹植(子建)、贬抑曹丕(子桓)的所谓“旧谈”大为不满,并从创作特点和文体的角度为曹丕进行辩护。他认为,这二人在写作上各有其擅长的文体:曹植所长在于诗、表这两种文体,而曹丕则在于乐府和论。可见二人各有所长和所短(“迭用短长”),评者只有了解到这一点,才不会做出无知的比较和评论。从引文来看,刘勰显然将曹丕作为一个文人而非帝王来对待,因此这段文字亦可看作刘勰从文体的角度,对文人相轻现象进行的一种批评。他敢于在“雷同一响”的“俗情”面前坚持己见,肯定并推崇曹丕的才华,堪称是后者的知音,更是对后者的认同。

但这种认同并非出于某种私情或偏爱,也并不意味着盲从,至少刘勰本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也没有发出这种声音。事实上,他在《文心雕龙》中

充分肯定曹丕并不断引用其观点的同时,也对其不吝批评之辞,如他认为:“魏文九宝,器利辞钝”^{[2]194};“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虽扑推席,而无益时用矣”^{[2]270-271};“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至于‘作威作福’,其万虑之一弊乎!”^{[2]359}“公幹笺记,丽而规益,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2]457}刘勰的这种态度,用他在《知音》篇中的话说,就是:如果要客观地对文章加以评论,就得“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2]715}相比之下,曹丕在《论文》中认为,如果要客观地论文,就得如“君子”一样,“审己以度人”,克服文人相轻的弊病。^{[1]720}可见二人都主张论文时要排除私心和爱憎的干扰。

刘勰在《序志》篇中认为曹丕的《论文》“密而不周”,并表示自己有“弥纶群言”之志,正表明他要在曹丕的基础上,将相关研究推进和深入。他同时在此篇中坦言:“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2]727}杨明照认为,这表明刘勰对于前人取得的成就“既有所继承,也有所批判。”^{[1]16}而如果举刘勰与曹丕关于七子的研究为例,这段话的意思可有三层理解:当他在评论七子时,凡与曹丕的论点有相同或相合之处,都并非意在“雷同”,实在是不能不如此;而与曹丕的观点相异或为曹丕所无之处,也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按道理不得不如此;不管相同或是相异,其目的都在于通过细致的分析,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这确实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所具有的认真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参考文献:

- [1] 萧统. 文选[M]. 李善,注.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 刘勰. 文心雕龙注[M]. 范文澜,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3] 王鹏廷. 建安七子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4] 范晔. 后汉书[M]. 李贤,等,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5] 陈寿. 三国志[M]. 裴松之,注.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6] 王运熙, 杨明.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7] 章学诚. 文史通义校注 [M]. 叶瑛,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8] 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9] 萧统. 六臣注文选 [M]. 李善, 等,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10] 王运熙. 中国古代文论管窥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11] 杨明照. 杨明照论文心雕龙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 田 军)

Initiation and Continuation: Cao Pi and Liu Xie's Studies on Seven Talented Writers of Jian'an Period

HU Gen-f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Cao Pi is an initiator and authority of the study on Seven Talented Writers of Jian'an Period, and his *DianLun LunWen* could be considered as a special treatise on these seven writers. Liu Xie also treats them seriously in his masterpiece *Wenxin Diaolong*, in which he accepts and carries on the viewpoints expressed by Cao and frequently quotes and paraphrases the latter's comments on these seven writers. Coincidentally, both Cao and Liu choose literary forms as the point of breakthrough in their studies, and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qi* to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However, a major difference lies between them is that Liu does more than Cao in both depth and comprehensiveness, and he provides bountiful and important example illustrations and additions to Cao's comments and viewpoints. Generally speaking, there is something called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their studies, which in fact makes them support and prove each other. Liu himself wishes to comment systematically numerous works, thus considers Cao's *Dianlun Lunwen* intact but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in these respects, his study on the seven writers serves not only as a continuation to Cao but a manifestation of his own ambition.

Key words: Cao Pi; Liu Xie; Seven Talented Writers of Jian'an Period; *Wenxin Diaolong*; *Dianlun Lunwen*